

語言學論文選譯

第五輯

中華書局

語言學論文選譯

第五輯

中華書局

內 容 提 要

本輯收了莫斯科大学語言学小叢書中的四种。(1)《語言的發生学分类法及語言亲属关系的概念》除討論了这种分类法和語言亲属关系以外,还以很大的篇幅介紹了世界上主要的語系。(2)《語言的形态学分类法》討論另一种跟語法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分类法。(3)《文字史概要》主要敘述西洋文字发展的历史,尤其着重在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4)《語言存在的客观性》討論了“語言”和“言語”的区别,答复关于这样的問題:語言存在于何处?如何存在?有哪些存在的方式?

語言学論文选譯 (第五輯)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5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7号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850×1168 耗1/32·4 1/2 印張·118,000字

1958年4月第1版

1958年4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2,300 定价:(9)0.65元

統一書号:9018.36 58.3,沪型

目 录

語言的发生学分类法及語言亲属关系的

概念·····	V. V. 伊凡諾夫著·····	1
語言的形态学分类法·····	P. S. 庫茲涅佐夫著·····	50
文字史概要·····	V. A. 科車尔基娜著·····	78
語言存在的客觀性·····	A. I. 斯米尔尼茨基著·····	113

語言的发生学分类法及 語言亲属关系的概念

語言的发生学分类法是根据語言的亲属关系进行分类的方法。它將各亲属語言联結在一起。这一种分类法底基础就是用历史比較法来研究諸亲属語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指出过用历史比較法研究亲属語言的巨大意义。恩格斯在其《論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和《佛蘭克时代》两篇著作中，对日耳曼諸語言与諸方言的分类給予了特別的注意。斯大林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一書中，也曾指出研究亲属語言的重要性。

語言的亲属关系(例如斯拉夫諸語言的亲属关系)是如何确定的呢？^①

第一表

	俄 語	波 蘭 語	捷 克 語	保 加 利 亞 語
水	<i>вода</i>	<i>woda</i>	<i>voda</i>	<i>вода</i>
田地	<i>поле</i>	<i>pole</i>	<i>pole</i>	<i>поле</i>
海	<i>море</i>	<i>morze</i>	<i>moře</i>	<i>море</i>
耳朵	<i>ухо</i>	<i>ucho</i>	<i>ucho</i>	<i>ухо</i>
脚	<i>нога</i>	<i>noga</i>	<i>noha</i>	<i>нога</i>
二	<i>два</i>	<i>dwa</i>	<i>dva</i>	<i>два</i>
百	<i>сто</i>	<i>sto</i>	<i>sto</i>	<i>сто</i>

① 本文中有历史比較語言学的問題，只联系着語言发生学分类法順便談一些。关于历史比較法所依据的各项原則，將由 А. И. 斯米尔尼茨基詳細論述。另外，可參看 А. И. Серебрянников 的論文《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 и критика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го четырехэлемент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Н. Я. Марра 历史比較法和对馬尔的所謂四要素分析法的批判》，載《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в свете трудов И. В. Сталина》文集，1952年，莫斯科大学出版。

研究現代斯拉夫諸語言的時候，我們發現它們之間有許多詞相同或者非常近似(見第一表)。

有时，某些詞的語音結構虽然非常相似，但也有差別，这种差別說明亲属語言之間存在着某种語音对应規律。例如，俄語、波蘭語和保加利亞語下列的各詞之間的对应規律就不难确定出来(見第二表)。

第二表

	俄 語	波 蘭 語	保 加 利 亞 語
头	голова	głowa	глава ^①
城	город	gród	град
声音	голос	głos	глас
飢餓	голод	głód	глад
烏鴉	ворона	wrona	врана
母牛	корова	krowa	крава
寒冷	мороз	mroź	мраз

正如斯拉夫諸語言的历史比較語法所指出的那樣，俄語的 *оло*, *оро*, 波蘭語的 *ło*, *ro*, 保加利亞語的 *ла*, *ра* 之間的对应規律應該認為是共同斯拉夫語音組 * *ol*, * *or* 向前發展的一種反映。就是說，*город*, *gród*, *град* 都來自古代共同斯拉夫語的 * *gord* (試比較詞根方面有亲属关系的德語詞 *Garten*, 英語詞 *garden* [花園]); *голова*, *głowa*, *глава* 都來自古代共同斯拉夫語的 * *golva* (試比較立陶宛語的 *galva*); 等等。

这样，我們便確定出：現代斯拉夫諸語言中有許多詞虽然發音各有不同，但来源却是一個。由此可見，研究斯拉夫諸語言的詞匯(首先是基本詞匯)，可以証明這些語言彼此非常接近。如果再研究一下它們的語法結構，那么這一結論就更加肯定了。譬如，斯拉夫諸語言

① “глава”, “град”, “глас” 等詞，在俄語(東部斯拉夫語)當中，不是自古就有的；而在保加利亞語(南部斯拉夫語)中却自古就存在。俄語中的這些詞是從古斯拉夫語來的(古斯拉夫語是以南部斯拉夫語的一個土語為基礎產生的)，因而具有南部斯拉夫語的語音特征。

的變格和變位形式就非常相近(見第三表)。

第三表

		俄 語	波 蘭 語
吃	現在時單數第一人稱	<i>ем</i>	<i>jem</i>
	現在時單數第二人稱	<i>ешь</i>	<i>jesz</i>
院子	複數主格	<i>дворы</i>	<i>dwory</i>
	複數屬格	<i>дворов</i>	<i>dworów</i>
	複數造格	<i>дворами</i>	<i>dworami</i>
	複數前置格	<i>дворах</i>	<i>dworach</i>

同時，研究斯拉夫諸語言的古代書面文獻時，還可以肯定，在創立這些文獻的時代，這些語言在形態學方面的差別比後來要小得多，而且就連許多結構學(句法)現象都是相同的。

斯拉夫諸語言基本詞匯間以及語法結構間的一致性應該如何解釋呢？基本詞匯的特點是具有極大的穩定性；至於語法結構，那就更穩定了。因此要想判斷一種語言的起源及其親屬關係，必須以研究其基本詞匯和語法結構為基礎。斯拉夫諸語言的基本詞匯和語法結構的一致性不能看做是偶然現象。偶然的只能是不同語言中個別詞的相同，而不能是整个語法體系和詞匯中最主要部分的相同。這種一致性絕不能是幾種本來毫不相關的語言的“匯合”。

斯拉夫諸語言為什麼近似，唯一正確的解釋是承認它們來自一種基礎語(язык-основа)——共同斯拉夫語。

研究斯拉夫諸語言的基本詞匯和語法結構，可以確定它們的共同來源是共同斯拉夫語。同樣，在研究斯拉夫諸語言、波羅的諸語言、日耳曼諸語言及印歐語系其它親屬語言時，又可以得出結論說，這些語言的起源也是一個。古代諸印歐語較之現代諸印歐語更為接近。在論及古日耳曼語之一——峨特語——時，恩格斯寫道：“在變位方面，現在時(敘述式)之各個詞尾形式，儘管遵循着輔音轉移規律有所變化，但仍舊與自古以來的諸親屬語言（尤其是希臘語和拉丁

語)的詞尾形式十分相近”^① (日耳曼語的輔音轉移規律 [передвижение согласных] 是一种語音发展过程, 它說明峨特語的 *b* 和古印度語的 *bh*, 希臘語的 *ph* 相对应; 峨特語的舌叶清擦音 *f* 和其他印歐語中的 *t* 相对应)。的确, 只要举一个作“携带”講的動詞为例, 对比一下古代諸印歐語中敘述式(主动态)現在时的变位法, 就会看出, 它們的詞尾形式确实非常相近(見第四表)。

第四表

	峨特語	希臘語	拉丁語	古印度語	古斯拉夫語	俄語
單數第一人称	<i>baira</i> ②	<i>phérō</i>	<i>ferō</i>	<i>bhārāmi</i> ④	берѣ⑤⑥	беру⑤
單數第二人称	<i>bairis</i>	<i>phéreis</i>	<i>fers</i>	<i>bhārasi</i>	берешу	берешь
單數第三人称	<i>bairiþ</i>	<i>phérei</i>	<i>fert</i>	<i>bhārati</i>	беретъ	берет
复数第一人称	<i>bairam</i>	<i>phéromen</i> (多利亞方言③) <i>phéromes</i>	<i>ferimus</i>	<i>bhārāmas</i>	беремъ	берем
复数第二人称	<i>bairiþ</i>	<i>phérete</i>	<i>fertis</i>	<i>bhāratha</i>	берете	берете
复数第三人称	<i>bairand</i>	<i>phérūsi</i> (多利亞方言) <i>phéronti</i>	<i>ferunt</i>	<i>bhāranti</i>	берѣтъ⑤	берут

古代諸印歐語的形态体系的一致性, 还可以用許許多多具有同样說服力的例子来証实。此外, 这些語言的最古老的一部分基本詞汇也具有共同的来源, 这也是不容置疑的。譬如, 現代波罗的諸語言(立陶宛語和拉脫維亞語)和古代印度与伊朗諸語言, 虽然在空間和時間方面都有非常大的距离, 但在它們的基本詞汇中却有許多詞相互对应。这种情况乍一看会使人感到奇怪。其所以如此, 就是因为基本詞汇具有稳定性。試比較拉脫維亞語的 *gous* [母牛] 和古印度

① 《馬恩全集》, 俄文版, 第十六卷, 第一部分, 388 頁。

② 峨特語的 *ai* 在 *r* 前(科学著作中通常写 *ai*) 表示 *e* 的音。

③ 古希臘語多利亞方言的形式。

④ 古印度語的詞尾 *mi* 是由另一种变位类型发展来的。

⑤ 不——鼻化元音, 由元音同鼻輔音的組合发展而来。

⑥ 斯拉夫諸語言中, 这个詞根的意义发生了变化: 不是“携带”, 而成了“取、拿”的意思(在由这一詞根派生出来的 *бремя* [負担] 一詞中, 还殘存着旧有的意义)。

語的 *gauh* [公牛]^①，拉脫維亞語的 *vīrs* [丈夫、男人]，立陶宛語的 *vyras* [丈夫、男人]和古印度語的 *vīra* [男人]，古伊朗語（阿維斯塔語）的 *vīra* [男人]（再比較拉丁語的 *vir* [丈夫]）；拉脫維亞語的 *asins* [血]和古印度語的 *asndh*（屬格）[血] 等等。這些詞在許多印歐語言里都是相同的，它們都源出于共同印歐語的詞匯。

由此可見，研究印歐諸語言的基本詞匯和語法結構，可以使我們肯定這些語言具有物質的親屬關係，它們的來源是共同的。用同樣的方法我們還可以確定芬蘭-烏戈爾諸語言、突厥諸語言以及其它一些語言之間的親屬關係。

語言的發生學分類法把世界上的語言依照起源分成若干系，從而巩固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成果。語言發生學分類法的重要意義就在于：它是一種歷史的分類法。許多語言以它們的物質親屬關係（即語言基礎的發源底一致性）證明它們最初是來自一種共同語的。而這種共同語形成一個語系的过程，則須通過操這些語言的人們的歷史來解釋。拋開社會歷史研究語言，不可能理解語言歷史，因此，研究諸語系形成过程必須同研究各民族——這些語言的使用者和創造者——的歷史聯繫起來。

許多語系，例如印歐語系，是在階級社會出現以前形成的。馬克思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的摘要中曾經提到：遠在“操拉丁、希臘和梵語的諸部落是一個族”^②的時候，在操印歐語的諸部落間就存在着氏族。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原始氏族制度的特點之一是通過分裂重新形成部落和方言。馬克思寫道：“分裂的經常趨勢在氏族組織各部分中扎了根，以後又為語言內部形成差別的趨勢所加強。在它們（即野蠻部落）的社會情況下，由於它們占據的地域非常廣闊，語言內部形成差別的趨勢是不

① 俄語中，只有最初派生的詞 *говядина* [牛肉]，保留了这个詞根；一些語言學家認為，這一詞根的另一形式 *гу* 存在于“*гумно*”一詞中，在這種情況下，這個詞的意義為牛打場的地方（見 А. П. Погодин, «Следы корней—основ в 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ках 斯拉夫諸語言中詞根詞干的痕跡》，1903 年，235 頁）。

② 《馬恩文庫》，俄文版，第九卷，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1941 年，137 頁。

可避免的。虽然口語在詞匯方面异常穩固，在語法形式方面更为穩固，但它也不会永远一成不变。地域上的分隔随着時間的前进必然使語言內部出現差別”^①。在适当的历史条件下，語言內部的差別可能使一个基础語的各支方言发展成为独立的語言。但基本詞匯和語法結構的穩定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使我們确定出亲属語言来源的共同性。不过各支亲属語言都是按照自己的內部規律向前发展的，所以随着社会历史的演变，它們之間的差异也会日益显著起来。古代斯拉夫諸語言和伊朗諸語言（如古斯拉夫語和古波斯語）就比現代这两族語言（如保加利亞語和沃舍梯語或俄語和波斯語）要相近得多。这不只是由于出現了新的詞語、新的語法結構和形式，而且是由于起初为各支亲属語言所共有的一些詞、語法形式和結構改变了原义或发生了变化的緣故。例如：古波斯語的 *rādiy*，按其意义和用法完全等于古斯拉夫語的 *radu*。可是发展到現在，情况就不同了：俄語中的 *ради*（如在 *цело ради* [为了什么] 这类組合中）与古代的 *radu* 仍旧很相近，而現代波斯語中后置詞 *-pa*（来自古波斯語 *rādiy*）的功能却根本不同了。在現代波斯語的語法体系中，这个后置詞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的功能大約相当于俄語中宾格詞尾的功能（但后置詞 *-pa* 常常用来表示“确定”的意义，在这点上与冠詞的功能很相似）。在类似的情况下，要想确定某些有物質亲属关系的詞或形式来自同一个根源，必須了解亲属語言的历史。

在某些情况下，基础語各支方言構成不同民族的独立語言之后，經過几千年的发展，这些語言会变得互不通气，甚至“差不多”丧失掉“原来統一性的任何痕跡”^②（这一点是恩格斯論及氏族制度时期語言发展的特点时談到的）。在这种情况下，語言（或語系）在发生学分类中所占的位置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見下面阿尔泰諸語言和高加索諸語言等）。

不應該認為語系只能在氏族制度时期形成。“民間”（“大众”）拉

① 《馬恩文庫》，俄文版，第九卷，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1941年，79頁。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5年中文版，91頁。

丁語就是在另一种历史条件（羅馬帝国的崩潰）下形成羅曼諸語言的。談到这个过程，斯大林写道：“……一个部族由于缺乏必要的經濟发展条件而还未成为民族，它的統一的語言因为国家崩潰便瓦解了；至于还没有在統一語言中被磨掉的地方方言，却活跃起来并成为形成單獨獨立語言的基础。例如，对于統一的蒙古語言，情形可能就是这样”。^① 蒙古語族的形成与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崩潰有关；当时的蒙古各支方言，在蒙古侵略者远征时期散布在整个中央亞細亞，后来关系隔絕了，就逐漸变成了独立的語言。

基础語的某一支方言形成了独立的語言之后，其发展的历史条件会使它本身又分出若干支方言，而这些方言又会发展成为独立的語言。譬如，共同斯拉夫語来自印欧語的一支方言，后来它本身又分裂出数支斯拉夫語，其中一支——东部斯拉夫語——又发展成了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等三种語言的基础。

另一方面，几种亲属方言也可能融合成一支語言；因此在語系的历史中，不但会有分裂現象，而且会有統一現象。

亲属語言这些复杂的发展过程也反映在語系內部諸語言的分类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指出，通过比較来确定差別对于比較語言学具有特別的意义^②。

在將几种亲属語言划入某一語系时，最重要的是找出事实証明它們之間的相似点，而在語系內部进行語言分类时，最重要的則是找出它們之間的差別。上面曾經举了一些例子來說明共同斯拉夫語音組 *ol, *or 在俄語(东部斯拉夫語)，波蘭語(西部斯拉夫語)和保加利亞語(南部斯拉夫語)中的发展情况(見第二表)。俄語的 *оро, оло*，波蘭語的 *ro, lo* 和保加利亞語的 *pa, ла* 之間的对应規律便是斯拉夫諸語言借以分成为語支的許多标誌之一。語系(或語族)下面的語支都具有一套不仅是語音，而且是詞汇和形态上的特征。

例如，日耳曼語族的北支(斯堪底那維亞語支)和西支就有所不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1953年人民出版社中文版，44頁。

② 《馬恩全集》，俄文版，第四卷，429頁。

同。首先斯堪底那維亞語支具有一系列的語法特点,如:后置的(即跟在名詞后面的)冠詞(瑞典語的 *dag-en* [日子] 相当于德語的 *der Tag*, 英語的 *the day*), 由動詞同反身代詞結合而成的反身語態(后来的被動語態)的特殊形式等等。其次,斯堪底那維亞語支在詞匯方面也具有許多特征,如當“做”講的動詞底詞根就與英語的 *to make*, 德語的 *machen*, 英語的 *to do*, 德語的 *tun* 都不一樣;在斯堪底那維亞諸語言中“做”的意思用另一個詞根表示(如瑞典語的 *att göra* 等)。最后,斯堪底那維亞語支還有一些語音上的特点。這些不同之處表明斯堪底那維亞諸部落和西日耳曼諸部落在很早以前就分開了。可見,語系(或某一語系的語族)內部親屬語言的正確分類,對於研究這些語言的歷史和使用這些語言的民族底歷史都具有重大意義。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當科學中確定了語言親屬關係這一概念之後,人們就那麼重視從最初的共同語中划分出親屬語系的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親屬語言分類法問題。

世界諸語言發生學分類研究史簡介

詳盡地研究語言發生學分類,只是到十九世紀有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成就之後才成為可能。不過對於某些語言之間的親屬關係,卻是很早以前就有過個別的天才的揣測。

早在中世紀時,人們就注意到了諸閃語的相似,以及愛爾蘭語同威爾斯(Welsh)語的親屬關係。十六世紀捷克學者揚·阿莫斯·柯緬斯基(Jan Amos Komensky)確定了芬蘭語同匈牙利語的親屬關係。十六—十七世紀確定各支羅曼語都來自拉丁語。1599年約瑟夫·尤斯士斯·斯卡里杰爾(Joseph Justus Scaliger)作出了歐洲諸語言的分類;但是他在正確地確定某些語族的同时,卻沒有看到這些語族(如印歐語某些語族)之間的親屬關係。德國學者萊布尼茨(Leibniz, 1646—1716)對語言分類的某一些看法也是非常卓越的;可是除了正確的看法外,萊布尼茨也做了些虛幻的臆測,無中生有地把許多語言看成了親屬語,而實際上這些語言卻屬於不同的語系。

俄国偉大的学者罗蒙諾索夫曾經写过一部著作論述一些語言的相似性。这部著作是1755年以前完成的,可惜后来遺失了,直到今天也沒有找到,只有一些初稿前的札記保存下来。然而,即使只根据这些札記也可以肯定:罗蒙諾索夫天才地予見了十九世紀历史比較語言学的許多原理;他精辟地闡述了亲属語言和非亲属語言的存在,并將这一原理应用到了斯拉夫諸語言及他所通曉的其他印欧語言中去,从而第一次确定了这些語言之間的亲属关系^①。罗蒙諾索夫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发现,印欧語言之間存在亲属关系的明証是这些語言的头十位數詞的相似。他对比了俄語的 *два*〔二〕,希腊語的 *δύο*, 拉丁語的 *duo*, 德語的 *zwei*; 俄語的 *три*〔三〕, 希腊語的 *τρεις*, 拉丁語的 *trēs*, 德語的 *drei* 等等^②。到了十九世紀,这一原理获得了公認。罗蒙諾索夫認為, 亲属語言以及亲属語族的逐漸分化可以发生在各个不同的时期: 波蘭語和俄語(斯拉夫語)很早以前就分开了, 斯拉夫諸語言和波罗的諸語言的分裂在更早的时候, 而拉丁語、希腊語、日耳曼諸語言同斯拉夫諸語言的分裂則又是远古时期的事了^③。这样, 罗蒙諾索夫便第一次提出了語系形成的复杂历史过程。可惜, 詳細論述这些見解的著作遺失了, 而初稿前的札記又只是在不久以前才引起国内外学者們的注意。

十八世紀后半期, 欧洲一些学者(克尔都 [Кёрду], 瓊斯 [Джонс], 保林 [Паулин]) 指出梵語与欧洲諸語言相似。俄国語言科学中1811年出版了一篇專著:《論梵語与俄語的相似》(作者不詳)。这篇著作以令人信服的例証(如梵語的 *asmi* 和俄語的 *есмь*〔我是〕, 梵語的 *asi* 和俄語的 *еси*〔你是〕的对比等等)指出了古印度語和俄語的亲属关系。欧洲学者們对古印度語和古代印度語言科学的接

① 詳見 П. С. Кузнецов 的《О трудах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а в област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論罗蒙諾索夫在历史比較語言学方面的著作》, 莫斯科大学学术札記, 第150期, 俄語部分, 莫斯科, 1952年。

② 參見《Числа сродственных языков 亲属語言的數目詞》一表,《罗蒙諾索夫全集》, 第七卷, 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 1952年, 652頁。

③ 《罗蒙諾索夫全集》第七卷, 658—659頁。

触与了解，在历史比較語言学的发展上起了巨大的作用。而正因为历史比較語言学的发展，研究世界諸語言的发生学分类才成为可能。

印欧諸語言之亲属关系的科学論証，是德国語言学家波普 (Fr. Bopp, 波普所写的第一部印欧語比較語法出版于 1816 年) 和丹麦語言学家拉斯克 (Rask, 拉斯克的印欧語比較語法的第一部分写成于 1814 年, 但出版較晚) 提出的。

俄国偉大的語文学家沃斯托科夫 (А. X. Востоков, 1781—1864) 曾經研究过斯拉夫諸語言, 他的著作 (1820 年出版的《論斯拉夫語》, 以及后来一些别的著作) 对于历史比較語言学的創立具有重大意义。

語言亲属关系的概念确定了。十九世紀前半期依据諸印欧語的材料又制訂了发现語言亲属关系的方法, 后来用这些方法又研究了其它語系的語言 (关于其它語系的历史比較研究見下)。这时便开始看到: 語系内部亲属語言的分类問題要复杂得多, 因为这个問題和語系的形成过程紧密地联系着。

十九世紀前半期就研究了亲属語言分类的原則和語系形成問題; 当时多半是依据印欧諸語言的材料, 而且主要是研究印欧語言的个别語族: 如斯拉夫諸語言、日耳曼諸語言 (格黎姆 [J. Grimm] 的語法第一卷出版于 1819 年)、罗曼諸語言 (狄茨 [Diez] 的罗曼語比較語法第一卷出版于 1836 年)。

十九世紀中叶, 俄国科学院通訊院士、德国語言学家 A. 史萊赫尔 (A. Schleicher, 1821—1868) 所提出的語系形成学說获得了广泛的傳播。这一学說以“系譜树” (родословное древо) 理論之名著称, 認為語系是經過逐次分裂形成的: 最初是由語系 (如印欧語系) 的單一“母語”分裂成数支母語, 这些母語再分裂成为各語族的母語 (如斯拉夫母語、日耳曼母語等), 各語族的母語本身再分成單独的語言 (試比較罗蒙諾索夫上述观点)。由于当时把生物学現象和語言学現象等同起来的幼稚看法占有統治地位, 所以語系的形成过程被描繪

成了系譜的样子：从一个主干分出若干个枝，这些枝本身又生枝分叉。史萊赫爾以及当代的其他学者沒有考虑到作为社会現象的語言的特点：語言的发展是和操該語言的人民的具體历史联系着的，因此不能把“系譜”的直綫图硬套在語言发展上。在語言学著作中，直到如今还延用着一些术语：如語言的“亲属关系”，語言的“系”（在印欧諸語言多作“家族”解——譯者），語系的“族”；这些术语都是与十九世紀把語言現象当成生物現象加以理解的作法分不开的。因此，要时刻記住，現代語言科学中使用这些术语是有条件的：語言亲属关系应理解为历史現象，而絕不是生物学的現象。

印欧諸語言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不能一看到两个語族（如伊朗和斯拉夫語族）有共同現象，就說它們中間有过一种特殊的母語（如伊朗-斯拉夫母語）；因为另外一些現象表明它們中間每一个語族还与別的語族非常近似（如斯拉夫諸語言和波罗的諸語言，伊朗諸語言和希腊語等等）。有鑒于此，1872年施密特（J. Schmidt）提出一种所謂“波浪論”，按照这种理論的說法，印欧語中新語言現象的傳播情形，就象把几块石头投到水里以后，水面上泛起的几束圈狀波紋一样，波与波可能相互交織起来。这种“波浪”（后来的說法是“同語綫”isogloss）能够把印欧語系的不同語族联結起来。后来，在研究語言地理学的时候，这种观点被肯定下来，但略有一些改动。二十世紀的語言学家們利用了語言地理学的成就，开始研究印欧基础語中存在的各支方言以及它們进一步发展的过程。这时，才开始不仅仅考虑亲属方言的逐次分裂，而且也考虑它們平行发展以及再行合并（即在亲属方言从共同基础語中分离出来之后的合并）的可能性；亲属方言統一（合并）过程的重要性，远在十九世紀，俄国的語言学大师弗尔图納托夫（Ф. Ф. Фортунатов）院士就曾經提出过。

但是，涉及到某些印欧語族的关系的許多問題，仍未得到充分的闡述。例如，一些現象把波罗的諸語言和斯拉夫諸語言联結起来，但这些現象的来源問題至今还处在爭執之中。許多学者曾經認為，可以推想古代有一种波罗的-斯拉夫共同基础語，后来分裂成了共同波

羅的語和共同斯拉夫語。但是與此對立，另一種觀點認為，波羅的諸語言與斯拉夫諸語言所以有共同點，不是因為它們來自波羅的—斯拉夫語，而是由於印歐基礎語的兩支親屬方言——波羅的方言和斯拉夫方言平行發展的結果。最後，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印歐基礎語的波羅的方言和斯拉夫方言最初分裂出去之後曾經單獨存在過，後來合併起來，過了一些時間又重新分開了。

另一方面，有人指出，波羅的諸語言之間也有着巨大的差別（如普魯士語同立陶宛—拉脫維亞語支之間）。不久以前，某些國外語言學家建議把古代波羅的諸語言和斯拉夫諸語言的傳播區域看做一個“同語綫束”。可是他們沒有考慮到，“同語綫”這一概念本身並不是解釋，而只不過是確定了一個有待解釋的事實罷了。確定波羅的諸語言和斯拉夫諸語言的關係時有這些困難。同樣，在確定印歐語其他一些語族的關係時也有這些困難，甚至有更大的困難。因此，就連業經幾代語言學家辛勤研究過的印歐諸語言的分類，也還不能認為是徹底解決了的。

至於其他語系的研究，那就更差了。運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原則來研究世界上各種語言，使我們確定了許多語系的存在，如：閃語系、芬蘭—烏戈爾語系、突厥語系等等。但是很多語系內部的語言分類（如非洲的班圖諸語言的分類），至今還沒有研究透徹，儘管這些語言的一致性已經為大家所公認。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許多語言研究得非常不夠，以致無法準確地確定它們在發生學分類中的地位。許多古代的語言（如前亞細亞和地中海一帶的死語言）沒有足夠的書面文獻，大多數現行的語言根本沒有古老的文獻，這也妨礙確定它們的親屬關係。

除了現行發生學分類的這些客觀缺陷（其中一部分是由於缺乏必要的材料造成的）以外，還須要指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大部分著作中存在着一個極其嚴重的缺點：即在研究親屬語言的過程中沒有同操這些語言的民族的历史聯繫起來。只有俄國大語言學家沙赫馬托夫院士曾經聯繫着斯拉夫各民族的历史研究過東部斯拉夫諸語言

的形成过程^①。象他那样的作品，要算做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語言学著作当中的例外。

目前国外語言学界，由于醉心于結構主义的主張，以致常常拒絕使用历史比較法来研究亲属語言。同时，某些国外語言学家由于过分夸大了語言融合(скрещивание языков)的作用，竟怀疑起語言发生学分类的原則，断言說語言之間根本不存在純粹的亲属关系。根据这些学者的意見，同一种語言(如羅馬尼亞語)可能同一个語族(如罗曼語族)有“一等亲属关系”，和另一个語族(如斯拉夫語族)有“二等亲属关系”^②。这些学者們沒有考虑到羅馬尼亞語的基础属于罗曼語(就是說：归根到底产生自“民間”拉丁語)。試比較羅馬尼亞語的人称代詞和動詞变位系統(第五表)。

第五表

	拉 丁 語	羅馬尼亞語	意大利語
現在时复数第一人称 唱	<i>cantāmus</i>	<i>cântăm</i>	<i>cantiamo</i>
現在时复数第二人称	<i>cantātis</i>	<i>cântați</i>	<i>cantate</i>
人 称 代 詞			
單数第二人称	<i>tū</i>	<i>tu</i>	<i>tu</i>
复数第一人称	<i>nōs</i>	<i>noi</i>	<i>noi</i>
复数第二人称	<i>vōs</i>	<i>voi</i>	<i>voi</i>

因此，尽管由于人們的長期交往，許多斯拉夫語詞进入了羅馬尼亞語，而且有一部分甚至进入了它的基本詞汇(試比較羅馬尼亞語的 *muncă* [工作]，古斯拉夫語的 *мѣка*，俄語的

① 試比較 A. A. 沙赫馬托夫下面這些話：“……只有……把語言的历史同其使用者、人民的历史联系起来，我才能有一个更具体、而不太抽象的依据”(見 A. A. Шахматов, «Введение в курс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часть I, 1916, стр. 9)。

② 如 Vittore Pisani, «Parenté linguistique 語言的亲属关系», «Lingua» v. III, 1, February 1952, pp. 3—16。这种論点的影响，在近来的、有关語言分类法的評述作品中可以看到：Tadeusz Milewski, «Zarys językoznawstwa ogólnego 普通語言学概論», część II, Rozmieszenie języków, zeszyt I (text) Lublin—Kraków, 1948 (Prace etnologiczne, tom I)。